

人口理论

“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其思考

蒋耒文

【内容摘要】 人口转变始于欧洲,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对欧洲人口转变历史的研究。近年欧洲人口转变出现新的形式和特点,并发展出“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国内学者对我国人口转变问题的讨论中,却几乎还没有触及这一新情况和新理论。本文总结“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观点,对比第二次人口转变和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特征,分析其转变的内在动因,及其未来的走向,并提出对世界和中国未来家庭及人口发展的思考。

关键词: 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第一次人口转变;中国人口转变

【作者简介】 蒋耒文,1966年生,北京大学人口所副教授。邮编:100871

以兰德里、汤普森、诺特斯坦等为代表的西方人口学家研究欧洲人口变动的历史概括出人口发展的过程、主要阶段和演变规律,创立了“人口转变”理论。这一理论作为最重要的人口学理论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演变,对此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表述方式,但从根本上来看,就是人口变动从前现代社会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转变为现代社会的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所谓的低生育率一般指更替水平。人口转变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生育率降低并稳定在更替水平便意味着人口转变的结束。但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西北欧国家的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并出现人口负增长。于是,有学者开始研究这种生育率在达到更替水平后继续下降的原因。1986 年开始,荷兰学者 Van de Kaa 和比利时学者 Lesthaeghe 发表一系列文章(如 Lesthaeghe 和 Van de Kaa 1986; Van de Kaa 1987, 1993, 1997, 1998, 1999, 2001; Lesthaeghe 1995),提出和论述“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把发生在 19 世纪到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人口转变称为“第一次人口转变”,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人口转变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认为: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相比,第二次人口转变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在变化的机理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近年来,“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在欧洲,一些学者运用这一理论分析近年发生在南欧和东欧的人口现象,欧洲最近所有重要的人口学术会议上都设有“第二次人口转变”专题,2001 年还在德国专门召开了关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学术研讨会。Van de Kaa 2001 年获得国际人口科学联盟的最高荣誉奖“国际人口科学联盟桂冠”(IUSSP Laureate),“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是其获得这一荣誉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总结“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主要观点,对比第二次人口转变和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特征,分析其转变的内在动因,及其未来的走向,并提出对世界和中国未来家庭及人口发展的思考。

1 欧洲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转变

1.1 第一次人口转变

19 世纪下半页到 20 世纪前半页,欧洲尤其是西北欧经历了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完成了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变动的“高高低、高低高、低低低”三个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实现了第一次

人口转变。

1.2 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婴儿潮”

二战结束后欧洲出现了生育率大幅度升高的现象,即众所周知的所谓“婴儿潮”。“婴儿潮”的出现从短期来看是一种战争过后的生育补偿,但同时又与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一起。二战之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逐步完善的保险系统使人们从过去对未来的担忧中解脱出来,坚信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与此同时,社会价值取向不断向家庭倾斜,幸福家庭是社会的中心。在这种条件下,马尔萨斯主义不再盛行,从而婚龄下降,独身者减少,生育率上升。这一代年轻妇女虽背负着沉重的生育、抚养孩子的负担,但却乐此不疲。人们似乎完全忘却了过去近一个世纪的生育控制和生育率下降。甚至有的人口学家预言:一个人口稳定增长的时代到了。

1.3 6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二次人口转变

然而,婴儿潮和幸福家庭模式仅仅持续了不到20年,1965年之后整个西北欧国家的生育率迅速下降。继西北欧之后,南欧和东欧的生育率也相继下降。而且生育率的下降几乎涉及到所有的人群,不论其宗教、社会地位、职业、受教育程度,都采取了某种措施加强生育控制。

伴随着生育率下降是一系列婚姻和生育制度的变迁。60年代中期后初婚率大幅度下降,初婚年龄上升,初婚初育间隔拉大,而总和离婚率大幅度提高,无证婚姻或同居成为一种可接受的选择;高效、无副作用避孕药具的开发,使人们得以早结合、晚生育,甚至不生育,同时婚外生育比也大幅度上升。

从区域间的比较来看,不同国家按照第二次人口转变开始的时间和所处阶段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西北欧国家加上南欧的意大利,它们是第二次人口转变开始最早的国家;第二种类型主要指南欧各国,第二次人口转变开始较晚,但速度很快;第三种类型包括东欧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发生巨变后,第二次人口转变正加速进行;最后一类包括北欧的冰岛和爱尔兰、南欧的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由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这些国家人口转变滞后,第二次人口转变还没有或刚刚开始。虽然存在时间和程度上的差异,但欧洲各国生育率下降的模式与婚姻状况的总体变动模式是一致的。

2 对两次人口转变特点和原因的解释

从形式上来看,两次人口转变都表现出生育率显著和持续的下降。两者在转变的原因方面有什么不同?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否就是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回复和延续?针对这种疑问,“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倡导者对两次人口转变的特点和原因进行了比较。

2.1 一次人口转变的特点和原因

关于第一次人口转变的原因,经典人口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已经有过很多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归因于工业革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同时,文明、理性、世俗化以及文化的传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世纪以前,人们认为性与生育的关系是自动的、无法避免的,因此,限制孩子数量的主要方法是通过宗教和道德的方式,采用禁欲、晚婚。进入19世纪,欧洲人逐渐认识到,性行为与生命的创造并不是不可分的,二者可由理性和科学组织方法加以控制,就象通过计划经营商业或工厂一样。家庭计划的主要目标就是如何使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于父母,这样生育控制与社会流动联系起来。家庭规模越小,孩子发展的可能性越大,上向流动的机会越多。法国社会学家杜蒙特用“社会毛细管论”来解释这一现象。这一时期的欧洲,期望孩子上向层社会流动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它是生育控制背后的深层动机。而避孕技术的发展为实践这种动机提供了条件,从此,人类控制自己的身体、控制性生活的后果就如同操控其它物体一样,生育与性行为得以分离,生育率的下降成为现实。

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也经历了一场类似于法国大革命、英国工业革命一样重要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情感的需求成为家庭和孩子的核心,父母主要的物资和精神的投资集中于子女的成长。这种社会被称为“孩子取向”的社会。孩子的数目不象过去一样随机了,而是通过家庭计划,减少到与家庭财

政状况相适应程度,孩子越少,时间和关怀可以越多地倾注到每一个孩子身上,越益于孩子的成长。

Van de Kaa(1987)把第一次人口转变的特点总结为四个方面:(1)婚姻的黄金时代,幸福家庭取向;(2)父母以孩子为中心,“孩子王”(king - child with parents)的时代;(3)单一家庭-小家庭模式;(4)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

2.2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特点和原因

Van de Kaa(1987)认为与第一次人口转变相比,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完全不同的人口和社会现象,表现为四个重要的转移:(1)从婚姻的黄金时期转向同居的破晓;(2)从孩子为王的时代转向以伴侣为中心的时代;(3)从预防性的避孕转向自我实现的避孕;(4)从单一家庭模式转向多元化的家庭户模式。这四个转移在人口学的指标上表现出15个顺序的变化(Van de Kaa 1997),归纳起来就是:(1)生命历程的多元化趋势;(2)婚龄推迟,家庭形成方式多元化,同居普遍被接受并获得与正式婚姻同等的对待,同性恋公开并得到社会认可;(3)两性关系更加趋于平等;(4)育龄推迟,生育意愿降低,终生不育者增多,婚外生育比例上升。

在如何看待这些变化时,不少学者提出了许多一般性的解释,如:(1)人们为了追求个人的快乐,不想对家庭和孩子承担责任;(2)为了追求个人的价值实现,不愿让孩子和家庭成为负担;(3)对人类的未来缺乏信心,因为原子弹、环境污染、艾滋病等,给人类的生存带来许多越来越难以预计的威胁,等等。固然,这些讨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了婚姻、家庭、生育价值和观念的变化。但还没有触及到更深层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变迁。

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社区”(Gemeinschaft)向现代“社会”(Gesellschaft)的转变。与传统“社区”相比,现代“社会”在结构方面表现为快速和不平衡的结构变迁,高度的差异性、互动性、复杂性,开放和流动,多重和部分的整合,广泛的中产阶层和福利国家;在文化方面则表现为文化价值观的快速转变,普遍性原则和目的取向,价值多元性,竞争和成就意识,个人主义,民主和平等。

正是现代社会制度所具有的这些特性,影响了欧洲第二次人口的转变。Van de Kaa(1994,2001)用“后现代化”和“后唯物主义”理论链解释这种变化,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构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中社会结构、文化和技术三个维度的变迁对个人、家庭和次级社会群体影响的理论框架:

首先从社会结构变迁来看,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富裕社会”或“福利国家”的现象。它伴随着从以制造业和物资生产为主的经济向以教育、健康、通讯和信息等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体系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自动化和电脑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理论知识和基础研究也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安全制度的完善使个人可以完全依赖于国家,教会或家庭的重要性降低。

其次,从文化变迁的影响来看,欧洲社会发生的价值和政治体制的变革可以用“无声的革命”来描述,它崇尚民主决策、宽容、个人自由和权利等,尤其是强调个人价值实现。个人主义的进程对人们的价值和态度发挥了深远的影响。次级社会群体功能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丧失了对其追随者维护公共道德的要求和摒弃异端邪说的保护功能。个人主义的进程也影响了不同性别、年龄、婚姻人口群体的关系。两性之间的竞争加强,青少年在行为方式上表现出独立于亲代及其所信奉的价值、规范的趋向。社会化的场所也由过去具有浓厚规范色彩的次级群体或家庭转移到更加中立的公共机构,如学校。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原则和需要建立个人的规范体系,传统婚姻和家庭模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一夫一妻制和婚内性关系不再具有严格的规范,离婚、同居和同性恋被社会普遍接受,结婚和同居在社会确认配偶关系方面越来越趋于平等;传统女性依附地位的规范和概念被完全抛弃,强调男女双方应该维持和延续个人独立的生命历程,保持家庭和职业双重角色,一旦这种理想难于实现,人们就会倾向于推迟建立婚姻这种长期关系的社会单元,同时,离婚率上升。

从技术变迁的角度来看,航空业的高度发达、电视媒体的扩展和避孕技术的进步是最重要的技术革新。首先,它使人们可以跨越广阔的地理空间获得关于其他国家和文化的第一手信息;同时,使人们能接收到在过去无法想象的大量的思想和观念;而且,还使人们在讨论避孕问题时不再感到任何尴

尬,可以象使用其他普通医药和技术服务一样使用高效、可靠的避孕药具。避孕技术的提高和使用消除了人们对非意愿怀孕的恐惧,直接影响了人们的性和生育观念与行为,导致人口趋势的变动。完善的避孕技术和信息使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婚前性行为、或结婚不生育、或同居直到怀孕后结婚、或决定在婚姻之外生育后代等。同样,避孕技术的提高使人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前提早结婚,之后则以同居形式代替婚姻,并导致初婚年龄的大幅度上升。

总之,发生在结构、文化、技术三个维度的变化使社会及个人已经准备、愿意并且能够实现第二次人口转变。

3 对中国人口转变趋势和意义的思考

死亡率的下降造成人口变动的不平衡,是第一次人口转变的起因。而第二次人口转变则是始于生育率的下降,它带来了人口变动新的不平衡。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欧洲国家的生育率陆续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且不少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了“极低的生育水平”,即总和生育率在 1.3 以下(Kohler 等 2001),只使用了不足 10% 的人类生育潜能,这种极低的生育率维持不了人口再生产的平衡。如果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欧洲持续下去,并扩展到世界其它地区,就如同发端于欧洲的第一次人口转变陆续在全球各地开展一样,那么,世界未来人口的发展将出现新的危机。

目前,欧洲多数国家出现严重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北和中欧多数国家曾从南欧、北非地区引进过大量的“客工”(guest worker),弥补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的不足。当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结束后,各国尽力将“客工”送返来源地,但都难以奏效。20 世纪 80 年代后,欧洲各国纷纷收紧了移民政策,控制外来人口以政治避难、家庭团聚等各种形式的进入,因为不想让高福利国家的“蜜罐”与其他人共享。然而,近年欧洲许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技术人才的严重不足,在世界经济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各政府纷纷制定政策,吸引第三世界的技术人才进入,但是,这种政策一方面遭到国内各种势力和利益集团的极力反对,另一方面,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也加强了对技术人才的使用,欧洲国家吸引人才的政策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通过移民减缓人口老化的压力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似乎不是好的选择。同时不少欧洲国家呼吁建立新的机制,鼓励生育,延缓或逆转人口负增长的形式。然而事实证明,这些政策可能在短期收效,但没有取得任何的长期效果。如此看来,人口负增长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欧洲的人口形势是否会成为世界性的潮流?第二次人口转变从西北欧开始,逐步蔓延到欧洲其他地区,现在欧洲国家似乎无一幸免。现在一些学者开始探讨第二次人口转变在其他非欧洲国家开展的可能与现实。如最近一项对日本社会的研究显示,日本也正经历类似欧洲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但表现形式不完全一样,如日本的同居和婚外生育的比例较低(Matsuo 2001)。

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人口控制的成就,20 世纪 90 年代初生育率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尽管现在就中国是否完成了人口转变学术界还存在一些争论,但中国人口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人们生育意愿的下降的现实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说强有力的计划生育政策发动了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而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则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现代生育文化传播的结果。上个世纪 70 年代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80 年代生育率的波动和 90 年代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反映了生育政策等外部动力影响的局限性和社会经济发展、现代生育观念确立等内在动力的决定性意义。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社会保障体系远没有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基础条件在中国还不具备,在中国谈第二次人口转变还为时尚早。但是,不能否认,在我国部分发达地区的城市,第二次人口转变已见端倪,如近年为数不少的调查表明,我国城市居民在婚前性关系、同居、婚外恋、离婚、同性恋、晚育或不育、两性关系等方面的态度和行为呈现令人吃惊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二次人口转变在这些地区已经开始。当然这些变化还只是富裕地区、特定人群的现象,与全国的情况有很大的差距。然而,对欧洲第一次人口转变历史的研究告诉我们,欧洲人口转变首先是在具有共同文

化和语言特征的地区展开(Coale 和 Watkins 1986),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了人口转变,但它不是人口转变的先决条件,文化的传播发动了第一次人口转变。随着我国对外开发政策的延续、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网络化的扩展,各地的文化和价值观不断影响着中国的新生代,中国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现代交通、通讯尤其是避孕技术的普及,在我国一些地区已经形成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条件,而且这些新思维、新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有着极强的传染性,第二次人口转变的形势和速度可能超出我们的预想,可能在表现形式上会不完全同于欧洲的情况,但其趋势将是一致的。今天,关于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讨论也许过于超前,但我们相信这种讨论对我们的社会是有益的。当今天我们还在强调稳定低生育问题的时候,第二次人口转变已经悄然兴起,而且这种转变极强的传染性和不可逆的特性,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中国政府、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注:本文的研究受到中流与喜玛拉雅基金会研究奖助学金资助。

参考文献:

- 1 Coale , A. J. and S. C. Watkins , 1986 ,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 in Europe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 Kohler , H. P. , J. A. Ortega and F. C. Billari 2001 , Towards a Theory of Lowest - low Fertility , Rostock , MPIDR Working Paper WP - 2001 - 032
- 3 Lesthaeghe , R. 1995 ,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Western countries : an interpretation , in Karen O. Mason and An - Magritt Jensen (eds.) : Gender and Family Change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 Clarendon Press , Oxford , p 17 - 62
- 4 Lesthaeghe , R. and D. Van de Kaa 1986 , Twee demografische transities ? In D. Van de Kaa and R. Lesthaeghe (eds.) , Bevolking : Groei en Krimp , Deventer , Van Loghum Slaterus , p 9 - 24
- 5 Matsuo , Hideko 2001 , Is Japan a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countr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URESCO Conference“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Europe , ”Bad Herrenalb , Germany , June 23 - 28
- 6 Van de Kaa , Dirk 1987 , Europe 's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 Population Bulletin , vol. 42 , no. 1
- 7 Van de Kaa , Dirk 1993 ,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revisited: theories and expectations , in Gjs Beets et al. (eds.) : Population and Family in Low Countries : Late Fertility and Other Current Issues , NIDI/ CBGS Publication , no. 30
- 8 Van de Kaa , Dirk 1997 , Options and sequences : Europe 's Demographic Patterns , Nethur - Demography Paper , no. 39 , The Hague
- 9 Van de Kaa , Dirk 1998 , Post modern fertility preferences : from changing value orientation to new behaviour ,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on “the Global Fertility Transition ”, Bellagio , Italy , May
- 10 Van de Kaa , Dirk 1999 , Europe and its population : the long view , in Dirk Van de Kaa (ed.) : European Population: Unity in Diversity. Kluwer Academic , Dordrecht , p. 1 - 49
- 11 Van de Kaa , Dirk 2001 ,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 concepts , dimension and new evidence , address delivered at the EUG RESCO Conference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Europe , ”Bad Herrenalb , Germany , June 23 - 28
- 12 Van de Kaa , Dirk. 1998 , Postmodern fertility preferences : from changing value orientation to new behaviour. Working Papers in Demography , no. 71 ,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Research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 Demography Program : Canberra

Ideas and Contemplation of the “ European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

Based on the generalization of European historical process of population changes, the theory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as constructed. In the recent decades, population changes in Europe show new trends and features, basing on which the “European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has been proposed. However, the new phenomenon and new theory are not referred at all in the discussion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mong Chinese scholars. This paper aims at summarizing the main perspectives of the “European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 comparing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first and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alyzing the mechanisms and the future trends of the transition. The last section briefs contemplation on the plausible paths of family and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s well a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 Europe , 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 the first demographic transition , population changes in China

Jiang Leiwen , born in 1966,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 at Beijing University.

(责任编辑:宋严 收稿日期:2002-03)